

2022年,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正式启动。牛河梁、马鞍桥山等红山文化遗址的发掘,近年取得了新的重要收获。结合多年来对红山文化和红山文明的探索,现简要谈谈红山文化与红山文明研究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些问题,希望能够助力“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的研究。

第一,关于红山文化的年代跨度问题。红山文化到底有多“长”,以往学术界的基本共识是自早至晚经历了1500年的时间。在发展阶段上,不论是“两期说”“三期说”还是“四期说”,多是较为宏观的认识,而少见更微观一点的探索。其实,通过对“老材料”的再分析,结合不断出土和公布的“新材料”,我们对红山文化时间长度的确认和年代刻度的划分,是完全可以再细致一些的,因为这直接关系到红山文明出现的准确时间节点问题。笔者最新的研究结果表明,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各自分立的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实际上应该是一体的考古学文化,即“小河沿文化”的早中期和红山文化的中晚期是年代相互对应、分布范围一致、材料性质有别、文化属性相同的“大红山文化”遗存。小河沿文化的晚期才是“大红山文化”的末期。将“小河沿文化”纳入红山文化的范畴之后,不仅填补了红山文化进入到文明社会时期缺少平民墓地和聚落材料的空白,也将整个红山文化的年代跨度向下拉长了约500年,即从原来学界公认的前后持续1500年左右,拉长至距今6500—4500年的2000年左右。与之相对应的是,开始于红山文化晚期前段(以原红山文化晚期和小河沿文化中后期为代表)的红山文明或称红山古国,也由原来的距今5500—5000年,延长到了距今5000—4500年的红山文化晚期后段(以原小河沿文化晚期为代表),前后两段共经历了长达约1000年的时间。如此,红山文化和红山文明本身的“轴线”更长了,内涵更丰富了,与后来本地区进入夏时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明之间的亲缘关系,更加明晰了。

第二,关于红山文化的分布范围问题。红山文化究竟有多“广”,以往有人划得偏大,有人划得偏小,至今未能形成共识。分析其原因,问题主要是出在对红山文化典型器物组合和基本特征认识的不同。接下来,必须直面问题,开展更深入的研究,从红山文化早期(距今6500—6000年)、中期(距今6000—5500年)、晚期前段(距今5500—5000年)、晚期后段(距今5000—4500年)四个不同阶段入手,逐一地进行地方“类型”的探索。红山文化的地方类型究竟有哪些?每个类型的分布范围和代表性器物是什么?以哈民忙哈为代表的类遗存到底能不能纳入红山文化的范畴?这些问题不解决,红山文化先民的属地范围和活动空间就无法确定,从红山文化跃升到红山文明或红山古国的核心区域亦说不清楚。

第三,关于红山文明的时间和标志问题。红山文明到底有多“久”,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红山文明出现的时间,即红山文明是在红山文化发展到哪个具体阶段出现的?什么时候结束的?二是红山文明形成的标志,代表红山“文化”进入到红山“文明”的具体物质载体和文明符号究竟有哪些,这些代表红山文明出现的各类标志是逐步形成的还是同时出现的。不把红山文明本身及其“前身后世”研究明白,就很容易混淆“红山文化”和“红山文明”的区别,混淆红山文化出现和延续的时间范畴与红山文明形成和延续的时间范畴。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全面分析和重新认识处在红山文化晚期前后两个阶段上的新、老两方面考古遗存。

第四,关于红山文明的材料和辨识问题。红山文明究竟是啥“样”,从目前的表现看,多数学者认为能够反映红山文明面貌的是以牛河梁、东山嘴、半拉山等为代表的高等级贵族或上层社会的墓葬类和祭祀类遗存,同时期普通阶层民众的生活居址和墓葬尚未发现。可以想象,只有前者、没有后者的红山文明社会肯定是不存在的,因此以考古中国“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为代表,当前工作的关键和重点就是加大力度寻找红山文明时期的普通聚落。与此同时,也不应忽略另外一种可能,即红山文明时期普通民众的生活遗存和埋葬墓地并非没有发现,而是没有被辨识出来。例如,以大南沟墓地为代表的原来被认为是小河沿文化中期的墓葬材料,很可能就是大家正在寻找的红山文明时期普通民众的遗存。换言之,原属于“小河沿文化”的“大南沟”墓地,有可能就是红山文化发展到红山文明时期的“平民坟冢”。

第五,关于红山文明的“生业”问题。辽西地区的红山文明到底是基于哪一种生业模式而产生并延续的,是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一样的“农业型”文明,还是有自身特色的“渔猎型”文明?目前学术界对此问题有很大的分歧,关键在于相关研究零星不成系统,单个遗址和单一时间段的研究具体结论固然可靠,但对于整个红山文化和红山文明而言,无疑是片面的、零碎的。我们期待从典型遗址入手,对红山文化生业模式进行从早到晚的全面分析和系统梳理,既要有定量分析,又要有定性研究,进而从根本上解决红山文化和红山文明的经济成分和构成比重,正确认识由东北辽河上游红山文化孕育而成的高纬度文明的自身特征和特有模式。

第六,关于红山文明的“祭坛”问题。在牛河梁遗址,发现了两类坛形遗迹,一类是“圆坛”,一类是“方坛”。围绕坛形遗迹,至少有三个问题需要再做

新思考：关于红山文化和红山文明的十个问题

赵宾福 任瑞波

深入具体的研究;其一,在性质认定上,为何要称这些遗迹为“祭坛”;其二,在修建时间上,特别是同一地点的两类坛,是同时的,还是有先后;其三,在具体作用上,这些“祭坛”到底是为谁而修建的,是“一坛一祭”还是“一坛多祭”,或是如部分研究者所言,这些坛形遗迹兼具祭祀和天文的双重功能。对于这些问题,不能“想当然”,要给出个“所以然”,因此还要下大力度开展研究。

第七,关于红山文明的“神”种问题。牛河梁遗址有“女神”,已是学界的共识。但是,除了牛河梁“女神”之外,牛河梁遗址和其他红山文化晚期遗址中还发现有不少人形雕塑,有陶质的,也有石质的,这些雕塑究竟是属于“神”的范畴,还是属于“祖先”的范畴,两者应该如何区分和界定?此外,红山文明时期除了“女神”外,是否还有“男神”,是否还有“动物神”?诸“神”在红山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时间上有没有先后,地域上有没有不同,级别上有没有差异,这些都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第八,关于红山文明“女神庙”的“身份”问题。作为红山文明的标志物之一,“女神庙”已为大家熟知,但“女神庙”究竟是何时建造的,使用了多长时间,目前还没有定论。具体说来,“女神庙”究竟是在牛河梁“下层积石冢”阶段建的,还是“上层积石冢”阶段建的,如果一些研究者提出的“女神庙”成立,那么“女神庙”与牛河梁“上层积石冢”和“下层积石冢”究竟有无关系、有何关系。此外,“女神庙”究竟是为谁修建的,是为牛河梁某一个地点的冢内贵族而修,还是为牛河梁多个地点或者全部地点的冢内贵族而建。最新的考古发掘表明,“女神庙”不是孤立存在的,其周边还有一些性质相同乃至级别更高的建筑。所以,从目前情况看,“女神庙”的“身份”恐怕还不能轻易下结论,应该紧密结合新材料进行新探索。

第九,关于红山文明“积石冢”的“性质”问题。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那些高大的“积石冢”到底属于什么性质,当前的讨论并不充分。我们倾向于牛河梁遗址已公布详细发掘和调查资料的十六个地点(有报道称有63处)可能为“一点一冢”,即每个地点发现墓葬的“积石冢”就是埋葬一代(世)“王”的“王陵”。冢上中心大墓埋的是“王”,周围小墓埋的是与“王”有血亲或姻亲关系的王室成员或权贵重臣。“积石冢”有大有小,“随葬品”有厚有薄,反映的应该是红山文明时期不同阶段的国力强弱与经济兴衰。冢与冢之间是时代的变化,不是一个时期内等级高低的差别。值得注意的是,牛河梁部分“积石冢”有明确的“上层”和“下层”之别,表明这些属于“王陵”的区域是可以持续埋葬或者被重复利用的,其缘由需要我们做仔细的研究。

第十,关于红山文明多处“积石冢”的关系问题。除了建平牛河梁,在朝阳半拉山、喀左东山嘴、阜新胡头沟、敦化草帽山、凌源田家沟等多处遗址都发现了红山文化晚期的大型积石冢。这些积石冢在时间上还能否区分出早晚,在等级上还能否划分出高低。如果认为牛河梁发现的部分大型“积石冢”属于“王陵”和贵族墓地性质,那么其他几处遗址发现的“积石冢”的性质又该如何确定。对此,我们的初步判断是牛河梁“积石冢”只是红山文明第一发展阶段上形成的部分“王陵”和贵族墓地,而半拉山等其他几处积石冢则是先于或晚于牛河梁“积石冢”阶段的红山文明另外几个不同时期的“王陵”和贵族墓地。

从上述十个具体问题出发,对红山文化和红山文明进一步开展全方位、多角度研究,新认识、新突破未来可期。与此同时,理念和思路也很重要,不仅要更新视角,更要有新内容和新要求。

首先,从表象上看,红山文化和红山文明探索好像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红山文化孕育了红山文明,红山文明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红山文化,两者无法分割。要想对红山文明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就不能不对红山文化做更全面系统的探讨。只有这样,红山文明研究才能取得新的突破。

其次,从研究上看,红山文明的讨论和阐释,必须从考古材料出发,必须从基础研究入手,既要与时俱进,又要循序渐进。首先是对新、旧材料的系统消化,其次是田野考古发掘现场的“精耕细作”,还有就是各类科技手段的运用。只有将“发现新材料”和“材料新发现”两相结合,红山文明的认识才能更客观、更准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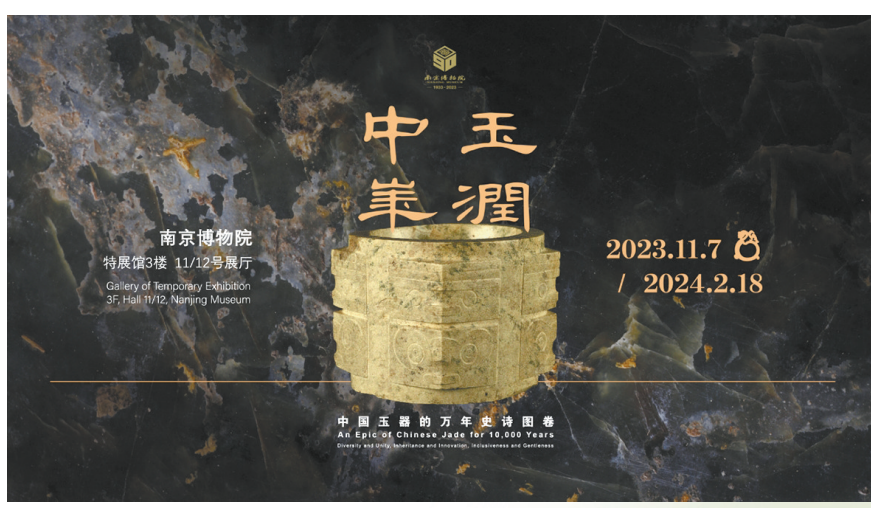
最后,红山文化和红山文明分布在中国东北地区,孕育它们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人文社会环境与其他地区的早期文明有所不同。在准确辨识和提炼红山文明模式与特征的过程中,不能随意选用其他地区现有的文明模式和标准来套用红山文明,而应一切从考古材料出发,本着切合实际、严谨认真、实事求是的态度。只有如此,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果。

总之,红山文化和红山文明的研究,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学术探索工程。面对不断涌现的新材料、新方法和新认识,我们要用动态的思维去理解、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平和的心态去面对。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玉润中华”展评 ——中国玉器的万年史诗

秦岭



玉器在中国的发展自新石器开始源远流长,是理解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讲清楚中国文化源流和特质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2023年11月7日开幕的“玉润中华”,是南京博物院庆祝建院90周年特展,也是一场关于玉器、玉文化和中华文明史的盛宴。笔者受邀参加了南京博物院“玉润中华——玉文化与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因此有机会获得夜场观展的特殊机会,在会期前后也跟着拥挤热情的观众反复观展多次。从考古专业和普通观众的角度,这个展览都值得推荐,不容错过。



正如展览副标题“中国玉器的万年史诗画卷”所言,“玉润中华”时间跨度之长、空间跨度之广,都是同类展览之冠。展品来自全国四十余家文博单位,共600余件。展览共分三个大的展区,分别是新石器时代的“玉生华夏”,三代至汉的“玉成中国”,以及魏晋至明清的“玉美神州”。“玉生华夏”由玉器起源阶段的“万年”和史前玉器多元发展阶段的“星辉”两个单元组成;“玉成中国”分为夏商西周时期行礼以玉的“呈礼”阶段,和东周两汉时期君子为玉的“比德”阶段;“玉美神州”则是包括了从三国魏晋到唐宋阶段体现多元交融的“琼华”单元,和体现明清玉器手工业高峰的“巧思”单元。整个展览的单元划分,呼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宏观节奏,用玉器书写了中华文明的历史长卷,也由玉文化体现出中华文明不同阶段的特质和时代精神。

从考古工作者角度观展,最值得称道的无疑是整个展览体现出的学术性和当代性。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精品文物展,而是处处体现出策展人对玉器置于不同情境中的“苦心”。

首先,以考古出土背景为依据复原的,是从新石器开始各类玉器饰品的穿戴使用方式。从黑龙江小南山出土最早的玉珠作为耳饰,到江苏东山村马家浜晚期M101开始出现用玉璜组佩当作颈饰,再到良渚早中晚不同时期高等级男女的全套佩玉体现出超越装饰性的礼仪制度(图一)。根据墓葬中出土位置来复原各类玉器的使用方式,这是考古学研究玉器的重要途径和成果,在展览中通过人形牌“穿戴”的方式向观众展示,非常清晰直观。一方面不多费口舌就解释了各类玉器的功能和使用方式,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早期玉器从“以玉为美”的装饰品到“以玉为礼”的身份标志物这样一个发展历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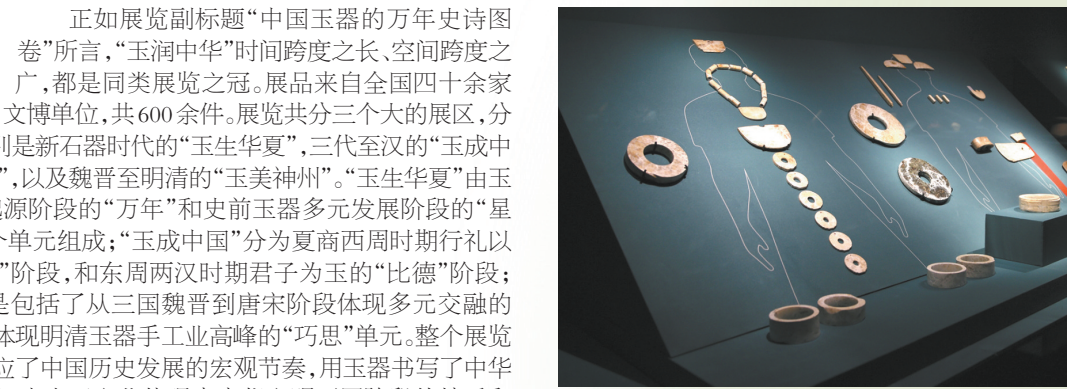
第二类颇费心思的,是用玉器同其他出土文物和文献相互印证来展示的“情境”。比如凌家滩出土的玉钺,和同时期江苏海安青墩出土的陶质装柄钺模型一起展示;仰韶文化的玉石钺,则佐以鸕鱼石斧彩陶缸的图像资料。虽说对于专业学者而言,钺在新石器时代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穿孔石斧可谓通识,但对于普通观众来讲,这样的互证才能望而生义,看懂钺这类玉器。又比如在展示汉代流行的“贝带”装饰和玉具剑时,通过不同地点出土陶俑和各类玉器实物的辉映,体现出文献记载中西汉早期贵族的穿戴规格。还有印象颇深的一例是青岛土山屯西汉晚期墓葬出土的玉麒麟佩,同出的墨书遣册上记录了“玉珠一”,两者互证可知当时的“珠”就是贵族佩挂于腰间被学界称为麒麟佩之物,可见玉珠到两汉时期已经有了不同的用法和意义(图二)。这些由专业研究所谓多重证据法得来的对玉器及其所处时代社会的认识,通过多重展示的手段表达给了观众,一个玉器展览的展品不惟玉器,也算是特色之一。

还有一些超出玉器的展品和展示方式,则可以是对历史场景的复原。比如明代文人案头复原的各类文房四宝和玉器,观众里的“文玩”爱好者看了肯定也会爱不释手,文人精神和玩好之趣就这样通过场景复原连接了古今。而有些历史场景的复原可能只有考古专业的同行才能体会,比如在展示石砺文化玉器时,借展了一块同样出土于石砺遗址的石雕,一开始以为是要说明石雕纹饰同肖家屋脊文化玉器的渊源,却发现石雕是同石砺出土的玉钺玉刀这些片状带刃玉器放在一个通框,因此猜测策展人是要体现“藏玉于墙”的石砺文化用玉特点,一块石雕、一把玉钺,就完成了展览对北方那座巍峨石城的抽象复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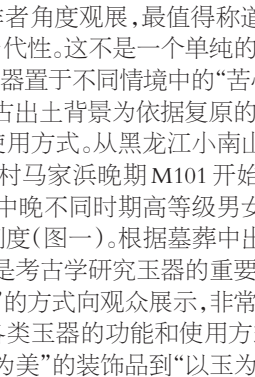
除了将玉器置于历史语境中这个特点,展览中还有很多策展团队学术功力的体现。最突出的当然是选择展品的用心。首先有很多新成果新发现及时体现在本次展览中,比如黑龙江小南山出土的目前中国最早的玉器,湖南孙家岗和湖北谭家岭出土的肖家屋脊文化玉器的重要新发现,还有凌家滩遗址所知的6件玉人之外近年新发现的残缺立体跪坐玉人等,这些展品均来自最近几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也使得这个展览具有了时效性。而我不够熟知的历史时期玉器中,相信也不乏这样的用心。战国两汉玉器中,让我这个外行最眼前一亮的是来自于巢湖博物馆的一组战国晚期玉器,玉璧、玉后,件件精品;而定州博物馆藏中山王墓出土的东汉时期西王母玉座屏,精彩程度更是让人驻足不前。一般人就算对两汉玉器略有了解恐怕也不及这样来自地方博物馆的重要文物。汉之后玉器的发展繁荣,使得展品的挑选不再局限于各省级考古机构和博物馆,这也需要策展团队有足够的学识和慧眼,才能兼顾展品的代表性和新鲜感。

另一个体现策展人学术功力的是对各类玉器年代的准确识读和“物归原处”的大胆安排。由于“玉”独特的材质具有恒久性和便携性,因此同样的玉器常常超越时空框架的限制,出现在不同地域和不同时代中,就像乾隆皇帝喜好收藏上古玉器一样,玉器的持续发展进程中不乏长距离交流和各类“早期遗留物”。在这次展览中,比比皆是放回玉器制作年代的“晚期”文物。比如新石器时代长江中游肖家屋脊文化玉器的展示单元中,就有出土于西周时期山西曲沃羊舌墓地的一件玉神面,以及首都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收藏的肖家屋脊玉器。比如晋侯墓地、虢国墓地等西周重要的贵族墓地中,常常出土来自商代的早期遗留物,有些是有领环、玉戈这样惟殷商流行的玉类,也有些是制作工艺上可以看出商代技术特色的小型玉器,这些都放到了商代的展示单元,一方面丰富了展览当商代玉器的分量,一方面也使得西周时期行礼以玉的特质更为突出和纯粹。还有像海昏侯墓和南越王墓当中的一些带有战国时代风格的玉器,也都被放回东周不同列国地区的展架当中。有意思的是,肖家屋脊文化所处的龙山时代、商周之际和战国晚期,均是人群交流和社会融合的大时代,后世所得的超越时空的遗留物多来自这样的历史阶段,正是玉文化体现时代精神和文明特质的最好证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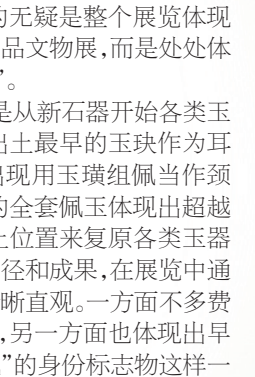
在庞大的主线下兼顾玉器研究的不同视角和尺度,也是“玉润中华”展览值得反复观展之处。以“星辉”为题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单独划分了让红山文化和凌家滩文化相互“对话”的单独展区,就兼顾了以考古学文化为单元的区域视角和以玉器为线索的文化交流互动之意,尤其是看到体型庞大的牛河梁16地点出土玉人,和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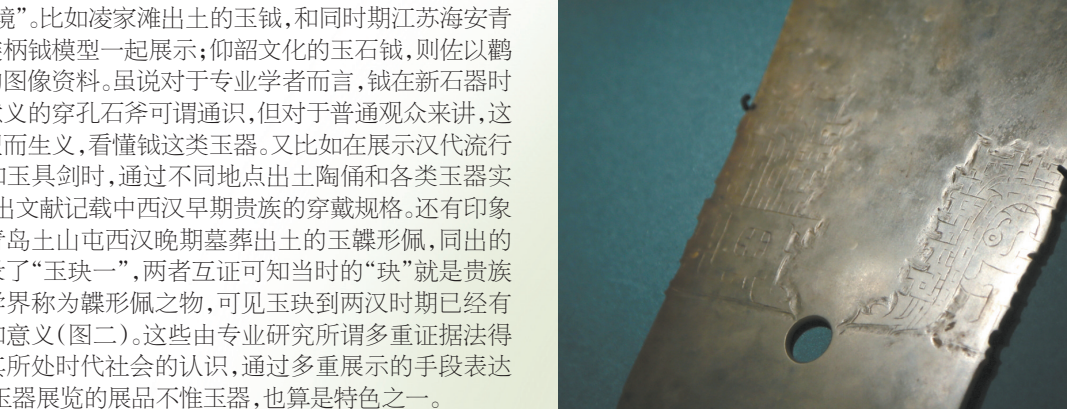
图一 用人形展示的良渚文化玉器使用



图二 汉代麒麟佩(块)同出土墨书遣册互证



图三 山东临淄郎家庄出土水晶组佩



图四 山西黎城玉钺的打光效果

家滩玉人置于同一个空间内,颇有趣味,值得比较。同样,对良渚文化玉器的展示显得尤为全面系统,兼顾了玉器料、型、纹的特质,包括了生产体系、使用制度和精神观念等不同维度。熟悉良渚文化的可能会发现来自反山M20的四件玉琮并没有按照共存关系集群展示,乍一看这似乎拆解了玉器出土的配伍关系,但稍留心就会发现,这四件玉琮根据各自的特点分别讲述了关于良渚玉器不同的故事,包括葬玉礼仪制度的体现,神人兽面纹饰的比较和良渚玉器的选料。在有限的展示空间内,能兼顾良渚文化不同阶段不同区域的社会,纹饰母题的嬗变甚至源流,一方面得益于南博丰富的文物资源和浙江同行的鼎力支持,另一方面也是策展人学术追求的体现。另一个让我反复观展的展区是东周阶段,这一单元的主题是“比德”,主线是玉器从外化的礼仪秩序往个人德行及审美的转变,副线则是以春秋战国各列国为区域单元的多元比较。山东临淄出土的春秋晚期水晶玛瑙玉人等(图三),同本地区战国晚期出土的楚式玉组佩遥相呼应,这两组展品均突出体现了由材质及设计之美,观众转身回眸,便间于齐楚,在务实的齐文化和浪漫的楚文化间穿越数百年,看到了那个缤纷多彩的战国时代。

需要提到的还有展览的形式和灯光设计。玉器本身器型很小,需要被观看的重点有时是纹饰细节,有时是材质温润,又各有不同,因此玉器展览对灯光和形式设计的要求很高。“玉润中华”展览设计了不同的主题色调呼应展线上的内容和节奏,比如一开始以绿色为背景,渐次变成深蓝色的展架,然后是黑色背景,最后明清皇家玉器辅以红色。用这样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带动观展的节奏,形式设计完全没有喧宾夺主之处,是不让观众看热闹,引领观众看门道的意思。从专业角度讲,这次的打光也是非常细致用心,很多之前在线录或者展厅没有办法观察的纹饰细节和制作痕迹,这次都能清晰地展现,甚至可以直接拍摄下来。比如山西黎城出土的龙山时代刻纹玉钺(图四),江苏溧阳采集的龙山双面刻纹玉圭等等,因为这类刻纹较浅,加上传世过程中多有磨损,因此无论发表线图还是现场观摩都有所欠缺,这次的展示当可补足这样的遗憾。展柜中各类配合文物的集中光束,也使得每一件展品都是主角,静静地站在舞台中央,摆出它最美的角度,吸引着众人的目光,也教会观众去领略文物之美。

最后,个人而言遗憾有二。第一是在新石器部分,还有不少区域社会的玉文化未能得到充分展现,比如,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齐家文化没能得到充分展示,只用了几件南京博物院的旧藏,没能充分体现玉生华夏中的“华夏”部分。但瑕不掩瑜,要用600余件文物讲述万年玉器与文明史,我想这样的遗憾总是难免的。遗憾之二是囿于我的学识所限,对于玉美神州的部分,无法充分体会到策展人的匠心和文物之美,策展人左峻先生原先就主笔过玉器通史当中的三国魏晋南北朝玉器,肯定最后一个章节中也充满了巧思和亮点,希望有机会能看到其他专家的点评和策展人自己的解读。

很高兴得知这个展览的展期会跨越跨年,到2月18日闭幕。在此,以观展心得的方式向广大读者和观众隆重推荐。评价一个展览肯定会有不同角度和标准,“玉润中华”无疑是一个精彩的玉器展,同时也绝不只是一个关于文物的展览,我想这就是对它最好的评价吧。(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